

辛亥革命

XINHAI GEMING

吳玉章





辛 亥 革 命

吳 玉 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60年·北京

辛亥革命

奥玉章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琉璃厂大街湖广会馆25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71号

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

书号:2892 开本:850×1163毫米1/32 印张:1

字数:18,000 册数:100,000

1960年3月第1版

1960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11-56

定价(3):0.13元

毛澤东同志在他的有名著作“新民主主义論”中，論述到太平天国革命以来中国人民進行民主革命的历史意义时，明确指出：辛亥革命是“在比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辛亥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次具有偉大历史意义的革命。这次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統治，結束了中国兩千多年来的君主專制制度，产生了中华民国，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觉悟，促進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中国在十九世紀中叶以后進入了一个曲折和复杂的轉变过程。在这个时期所发生的一切社会、政治和思想的变化，可以說，都是导向这次革命的。因为在这个时期侵入中国的是来自欧洲和美洲的资本主义势力，中国必須經過严重的社会改革，使自己資本主义化，才能同它相对抗。中国最早的资产階級政治家如康有为和梁啓超等曾經認為这种改革也可以用革命以外的其他方式，例如日本的方式，即依靠政府采取一些改良的方式来完成。但是一直到十九世紀末，清朝政府除了用外国槍炮武装军队和办几个

工厂以外，拒絕在政治上進行任何改革。一八九八年的戊戌政变就是清朝政府中当权的頑固派拒絕政治改革的坚决的表示。如果当时清朝政府在抵御外侮方面是坚决的，那末，拥护它的人也許要多一些。可是清朝政府在这方面表現得十分无能，甚至无能到了令人不可容忍的地步。一八九九至一九〇〇年义和团发动了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清朝政府不但不能給这个斗争以任何有效的支持，八国联軍進入北京，它又屈辱地訂立了辛丑条約，承認外国在中国有駐兵权，并賠款四億五千万兩，分三十九年还清，本息合計九億八千万兩，以海关稅和鹽稅作抵押，由外国派員監收。这样，中国不仅直接地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武裝威脅，而且还讓它們干涉中国的財政收支。中国更深地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泥坑。

这个条約当时特別使人感到憤慨。孙中山說，以前他奔走革命，人們把他看做危險分子，不敢同他接近；而在此以后，他就得到了很多的同情者，主張革命的人越来越多了。为什么会有这种轉变呢？广大群众爱国心的提高，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为什么这个时期孙中山所鼓吹的民主革命会得到很多人同情呢？这是因为有了新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就是資產階級。資產階級是当时一个新兴的階級。它的出現大約是在十九世紀八十至九十年代，到了二十世紀初，可以說已經初步形成为一个階級了。

試看民族工业在这个时期的发展罢。在一九〇〇年以

前，完全由民間舉辦的廠礦企業，資本在一萬元以上的，有一百二十二家，資本總數為二千二百七十七萬元。到一九〇六年，就已經發展到一百三十六家，資本總數為二千七百萬元。其中以棉紡織業的發展最為顯著。一八九六年全國紗廠十二家，其中華商七家；共有紗錠四一七、〇〇〇枚，內華商占二五九、〇〇〇枚；織機二、一〇〇架，內華商占一、七五〇架。就當時棉紡織業最發達的上海和江蘇來說，一九〇二年上海共有紗廠十七家，紗錠五六五、〇〇〇枚；一九〇八年江蘇共有紗廠二十三家，紗錠五八七、〇〇〇枚，織機三、〇六六架。縲絲業的發展也很顯著。一八九五年上海共有縲絲廠十二家，一九〇三年增加一倍，絲機八、五二六架；一九〇九年增加到三十五家，絲機一一、〇八五架；一九一一年增加到四十八家，絲機一三、七三八架。此外，面粉、火柴、水泥、煙草、玻璃、機器製造等各種行業都開辦起來了。

這些資本主義企業的發展當然還是很不夠的。但是正因為不夠，資產階級就更有發展它的要求，對外國資本的威脅更為敏感，對政治改革的關心也更為迫切。以修鐵路為例。中國人在甲午中日戰爭以前並不認識修鐵路是一件多么迫切的事情，這次戰爭以後，由於外國人的鼓吹和自己的覺悟，懂得了修鐵路的重要性。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就開始大規模地修築鐵路。清朝政府早已債台高築，哪里還有許多錢來修鐵路呢？要修鐵路就只有借外債。一八

九六年清朝政府決定成立鐵路總公司，派親美的大買辦盛宣懷為督辦。盛宣懷主張“借美債，用美匠”來築路。當時帝國主義列強正在中國瘋狂地掠奪海港和爭奪勢力範圍，鐵路投資更成為它們用來鞏固在華勢力範圍的工具。這個借外債築路的辦法，引起了列強的競爭，也引起了中國廣大人民的反對。湖南省有個資本家名叫禹之謨，是長沙的商會會長和教育會會長，一九〇〇年參加過唐才常在湖北的起義活動，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六年在長沙開工廠，和同盟會一派的革命黨人有聯繫，因此，清朝政府在一九〇六年夏天把他逮捕起來並在一九〇七年初把他絞死了。他就是資產階級中反對借外債築路的一個積極的鼓動者，在做商會會長時期如此，在牢裡也如此，並且把反對借外債築路作為他的遺囑。

這個時期，“收回利權”的呼聲響遍全國。江浙人民為爭回蘇、杭、甬建築鐵路權所進行的英勇鬥爭得到勝利，更鼓舞了全國人民。反對借外債開礦也是在當時資產階級中引起軒然大波的事件。山西曾經有些人自動籌集資金，從英國人手里把礦權贖回來。反對借外債修築鐵路和開采礦山的事件，其他各省也曾陸續發生。

在這個時期裡面，愛國運動差不多是一觸即發的。一九〇四年冬和一九〇五年初，由於反對美國虐待在那裡工作的中國工人，中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就發起了大規模的抵制美貨運動，這個運動波及十多個省的大小城市。

中国资产阶级还有一部分是在国外的，这就是华侨资产阶级。华侨资产阶级有很多人是从小商人出身，甚至有的是从工人出身的，同国内封建统治阶级联系比较少。同时因为他们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又受到外国人的歧视，深恨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容易产生革命情绪。

孙中山的活动就是从华侨里面开始的。孙中山本人出身于农民家庭，但这不是一个纯粹的农民家庭。他的哥哥早年到檀香山经营畜牧业发了家，他小时候就到那里依靠他哥哥读书，所以他本人也可以说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他所建立的兴中会，华侨占会员总数百分之七十八，其中有百分之四十八是华侨资产阶级。他后来在沿海各地从事武装起义，也都是靠华侨在经济上给以支持的。

这些现象说明资产阶级确实是要求政治改革的。但是资产阶级不是唯一的革命阶级。当时资产阶级还很弱小。革命派所以对革命具有信心，主要是因为广大群众的革命化。

一九〇三至一九一一年間的社会状况反映出外国资本侵入中国的严重后果。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原是很低的。但是在外国资本侵入中国以前，不少人还可以勉强地用各种方法来维持生活。例如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民，很久以来，都是男耕女织，兼营副业或手工业，在封建统治下过着十分低下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在鸦片战争以后一、二十年間，外国人还为上海和广州附近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的普遍而感到震驚。可是到了十九

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農村出產的土布就開始為廉價傾銷的外國貨所代替。其他如絲織品和瓷器本來都在出口貨物中占有重要地位，這時却都因出口的減縮和入口的增加而衰落下去。這樣，農民和小手工業者的活路少了，同時清朝政府的捐稅和地主的剝削反而加重，他們的生活自然更為困苦了。所以在这个時期以“抗捐”、“抗稅”、“搶米”一類口號發動起來的農民暴動，一年年有加無已。從一九〇七年到一九一〇年，僅長江中下游所發生的“搶米”、“抗捐”事件，就有八十多起。一九一〇年湖南長沙的搶米風潮和山東萊陽的抗捐鬥爭，參加的群眾都有幾萬人。

隨着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也逐漸壯大起來。中國工人階級很早就參加過革命鬥爭。一九〇六年安源煤礦工人六千餘人參加了同盟會在萍鄉、瀏陽、醴陵舉行的起義。一九一一年川漢鐵路築路工人舉行起義來響應資產階級反對清朝政府“鐵路國有”運動。此外，工人為改善本身生活條件曾進行過多次罷工鬥爭。

這個大動盪反映了封建社會的日趨瓦解。在這個大動盪中，不僅許多工人、農民和手工業者起來反抗，而且也有不少比較開明的地主階級分子表現不安，想尋求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出路。出路在哪裡呢？當時封建主義已經毫無出路了。要出路只能跟資產階級跑。所以他們中間有很多人卷入了資產階級的政治運動，不是變成孫中山的信徒，就是變成康有為和梁啟超的信徒。

正是由于全国人民日益明显地倾向于革命，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才先后出現了一些地方性的、小規模的革命团体。这些团体是由小資產階級分子、資產階級分子和一部分比較开明的地主階級分子組成的，成份不一，但都是反对清朝統治的。一九〇五年，这些地方性的小团体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联盟，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同盟会的綱領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除了推翻清朝政府以外，还主張建立民国，并且根据孙中山的建議，增加了一条平均地权。这个綱領就是辛亥革命的綱領。

二

从上面所說的情况可以看出，在辛亥革命以前的十年間，革命形勢已經相当高漲了。从人民方面來說，已經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从統治者方面來說，也已經不能照旧統治下去了。

人民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就倾向于革命；統治者不能照旧統治下去，就力图緩和革命，以便从危机中挽救自己。所以清朝政府到了二十世紀初期已經不能象戊戌政变前后那样頑固了。它陸續頒布了一些实行改革的命令。这些改革包括：廢科举、設学校、派游学、裁冗員、設立商部并对民族工业采取保护政策等，都是康有为在戊戌时期求之不得的。但此时人民对于政治改革的要求已經比“戊戌”时

期大为提高，清朝政府尽管实行了一些改革，也不能使人们感到满意。清朝政府迫不得已，在一九〇五年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表示同意立宪；一九〇八年宣布筹备宪政期间为九年，到一九一七年完成。一九〇七年改商部为農工商部，宣布对兴办实业的人給以奖励：投資二千万元以上者賞一等子爵，投資十万元以上者賞五品銜。这些措施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了資產階級的政治地位，并且許諾了更大的讓步。

清朝政府所实行的和許諾的这些改革，引起和加劇了資產階級內部的分裂。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認為，清朝政府的改革是虛偽的，諾言是靠不住的，必須推翻这个政府才能建立民主制度；以康有为和梁啟超为首的立宪派代表資產階級右翼和一部分地主官僚，他們認為，清朝政府的改革尽管是虛偽的，諾言尽管是靠不住的，但是已經有了進行合法斗争的可能性，与其忍受革命的痛苦，不如用合法方式来爭取政治改革的進一步实现。

当清朝政府还在拒絕改革的时期，革命派就已經开始出現了，并且和立宪派有了意見分歧。到了一九〇五年前后，这种分歧越来越大。結果，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发生了分裂。

这种分裂在一九〇九年以后更加显著。因为在这个时期，清朝政府宣布在中央設立資政院，在各省設立諮議局，这是一种类似資產階級議会的机关。資政院照規定設

議員約三百人，其中一百二十五人由皇帝委派（其中王公世爵十人，宗室五人，中央各部院官員一百人，業主資產在一百萬元以上者十人），另由各省諮議局議員互選本省議員定額十分之一，約一百六七十人。各省諮議局議員由各縣選舉，凡在当地办教育或其他公共事业三年以上的，中学以上學校畢業或舉貢生員以上出身的，曾任文官七品、武官五品以上的，在当地有五千元以上工商业或不动产的，都可以当选。按当时全国二十三个省区計算，共有議員一千六百七十七人。諮議局可以議決本省应兴应革事件，預決算、稅法、公債以及本省担任义务之增加等。这样的机关对于資產階級上层分子显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他們中間有很多人都参加進去了，有些人还被推举为議長。

資政院和諮議局的設立，除加深了資產階級內部的分裂以外，还有兩種作用值得注意。

第一，它具有提高民主主义覺悟的作用。这个机关既是議會性質的，各地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中要求改革的人很多都被选進去了，就立即成了一个要求政治改革的講壇。隨着革命运动的高漲，請願立宪的运动也日甚一日，政治改革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結果，清朝政府只好繼續讓步，本来宣布在一九一七年实行宪政，此时又宣布提前四年，在一九一三年实行宪政。然而这种讓步仍然不可能使人們感到滿意，甚至諮議局的議員們也有很多人因为清朝統治者缺乏進行改革的誠意而失望。四川、湖南、

湖北和广东等省反对借外債築路的运动，山东、山西等省反对借外債开矿的运动，也都是在諮議局里面哄鬧起来的。这些运动都关系到一般群众的利益，議員們越是鬧得兇，卷入的群众也就越多。群众是反对清朝統治的，他們既然参加進來，就把議員們的運動变了質，变成了反对清朝統治的革命运动了。所以，諮議局的議員們虽然极大多数只是些改良主义者，并不贊成革命，可是最后他們还是做了革命的不自覺的工具。

第二，諮議局也起一种消磨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和加强它的妥協性的作用。参加諮議局的資產階級分子多数是屬於上层知識分子。尽管他們迫切地要求政治的民主改革，然而并不要求社会的民主改革。現在他們又同地主階級的紳士們在諮議局里面形成一条要求政治改革的陣綫，就勢必要進而反对社会的民主改革了。这个現象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因为諮議局是辛亥革命前資產階級立宪派在国内所占有的巩固地盤，它使得革命派在革命爆发以后完全处于劣势。立宪派成了主人，革命派成了客人，而主人是同封建势力緊密联系在一起的。

由此，我們可以對諮議局的作用作这样一种評價，即：它在革命以前，一方面削弱了革命的力量；一方面因为要求政治改革，揭露了清朝政府的腐朽无能，反而促進了革命运动的发展。在革命以后，它虽然竭力表示是共和制度的拥护者，但是因为和旧势力在一起形成了对抗革命派

的联盟，在实际上阻碍了革命运动的发展。

三

从分散的地方性的革命团体到这些团体的联合，建立起同盟会，这是革命运动的一个重大的发展。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把这个发展考察一下，就可以看见，它的成就主要是产生了一个共同纲领，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四句话说了三件事：一、推翻清朝政府；二、建立中华民国；三、平均地权。其中，建立中华民国和平均地权的提出，是同盟会和它的领袖孙中山的伟大的贡献。在同盟会成立以前，历来主张推翻清朝政府的人都以恢复明朝或者建立汉族帝国为口号。一八九四年兴中会所提出的纲领中有建立合众政府一条，但是什么叫合众政府呢？这个名词很可能是从美利坚合众国脱胎来的，那末合众政府也就是联邦政府。联邦政府当然也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形式之一种。但是当时中国迫切需要的是提出民主主义的政治概念。可见兴中会时代的革命思想也是不够明确的。此外，在一八九五年还出现过“台湾民主国”。这是台湾人因为清朝政府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不甘忍受日本的统治而成立的。为什么叫做民主国呢？并不是因为台湾已经有了资产阶级，要求民主政治，而是因为台湾已被清朝视为化外，没有了君主，所以只好借用一个资产阶级

的名詞，叫做民主國，而年号仍旧称为“永清”。“永清”的意义既可以理解为永远属于中国，也可以理解为永远属于清朝。試看台灣民主國總統唐景崧在回到國內以后仍旧是清朝的臣子，副總統丘逢甲在辛亥革命前成了君主立宪的拥护者，就可以知道他們并没有真正的民主思想。同盟会成立以后，建立民国的思想很快就普遍起来，建立汉帝国的話从此再也沒有人提起了。所以同盟会綱領在当时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平均地权更是一个新的理想。这个理想表明比較西方資產階級后進的中国資產階級希望他們的共和国能夠因为同農民建立良好的关系而獲得長久的寿命，不致在革命以后不久又发生第二次革命。

但是在当时人們的心目中，同盟会的三条綱領里面究竟哪一条是最重要的呢？当然不是平均地权，也不是建立中华民国，而是推翻清朝政府。行动的要求首先是推翻清朝政府，这是不待說的。問題是，为什么要推翻清朝政府。是为了建立中华民国嗎？当然有許多人是為了建立中华民国而主張推翻清朝政府的，这些人主要的是属于資產階級革命派。但是有更多的人是因为簡單地反对清朝政府而主張革命的，这种人各階級都有，非常普遍。他們痛恨这个政府不仅因为它的腐朽无能和它所帶來的民族災难，而且因为它主要是由滿洲貴族所掌握并厉行种族歧視政策的。有的人甚至說，即使清朝政府实行民主改革，也必須

推翻它。資產階級利用了廣大人民反對清朝統治的情緒來鼓吹革命，這是對的，不過當時資產階級革命派本身的認識同一般人幾乎沒有什麼區別。他們的宣傳給人印象最深的只有兩點：一是反滿；一是漢族祖先的光榮傳統。這種宣傳起了很大的作用，革命的风暴主要是這樣鼓動起來的。但是這種宣傳有很大的弱點。反滿這個口號太簡單了，它把一切的仇恨集中在滿族統治者身上，其中摻雜着漢族人民的種族主義情緒，而沒有真正提高全國人民的民族意識。結果放過了一個真正的民族敵人——外國侵略者。同樣，對於漢族祖先的光榮傳統的宣傳也太簡單了，沒有批判、反對那長時期統治中國的漢族的封建主義，這就又放過了一個內部的大敵人，也就是支持了清朝統治的漢族封建勢力。因此，革命派在辛亥革命以前儘管作了許多政治鼓動，並且作了一些啓蒙工作，但是因為內容過於簡單，同時也沒有在理論上作詳細的說明，以致未能攻破封建主義的思想堡壘。他們在理論方面不但缺乏創造性的活動，而且對西方十七八世紀啓蒙學者的著作和十九世紀中葉的主要思想家的著作也都沒有系統的介紹。目前我國翻譯出版的許多外國古典著作，其實是在辛亥革命前就應當由資產階級學者翻譯過來的。沒有強有力的思想革命作先導，是辛亥革命的一個重大的缺陷。

我們應當承認，那些熱烈地充滿反滿情緒的革命分子是非常令人尊敬的，他們滿腔熱血，慷慨悲歌，處處表現

願意為推翻清朝統治而獻出整個生命。他們的自我犧牲精神在人民中留下了永不磨滅的印象。

然而這些勇敢的人們的行動並不是一致的。例如，在組成同盟會的小團體里面有這樣一個團體，叫做光復會，又名復古會。它的會員有的拒絕參加同盟會，獨立行動，著名的烈士徐錫麟就是其中的一人，他以刺殺安徽巡撫恩銘而成為歷史上的英雄人物。有的人參加了同盟會，可是不久又主張分裂，著名的學者章太炎就是其中的一人，他是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主編，一九〇九年竟散發傳單攻擊孫中山，辛亥革命以後立即宣告脫離同盟會，另組小派別。

孫中山在當時積極地領導了武裝起義。孫中山認為清朝統治到了二十世紀初期已經好象一座破屋子，只要抽掉裡面的一根木頭，或者挖倒一面牆腳，就會整個塌下來。所以他在同盟會成立以後所從事的革命活動，包括聯絡會黨和籌款，都是為了組織起義。但是孫中山的起義可以說都不是以在群眾中的耐心的工作為基礎的，而只是一種軍事投機，因此起義不斷失敗。他經常組織一批武裝的敢死隊在西南沿海的某些地方或那些住有清朝防軍的地方進行突然的襲擊，既沒有接濟，也沒有當地群眾的援助，聯絡工作又做得不好，結果每一次都失敗了。一九一〇年廣州新軍起義失敗以後，那些領導起義最積極的分子如趙聲、黃興等，因為遭受了很大的損失，都有些灰心喪氣了。當時國內革命形勢日益成熟，如果不能繼續推動革命，豈不太可惜了。